



# 批判與希望

——以行動為中心的教師哲學

方永泉 著

# 批判與希望

——以行動為中心的教師哲學

---

方永泉 著

 PE 學富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批判與希望——以行動為中心的教師哲學

/方永泉 著。

-- 初版 -- 臺北市：

學富文化, 2012.03

面： 公分

ISBN 978-986-6624-72-8 (平裝)

1.教師角色 2.教育哲學

522.2

101003182

初版一刷 2012 年 3 月

## **批判與希望——以行動為中心的教師哲學**

作 者 方永泉

發 行 人 于雪祥

發 行 所 學富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 址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 118 巷 2 弄 20 號

電 話 02-23780358

傳 真 02-27369042

E - M A I L proedp@ms34.hinet.net

印 刷 上毅印刷有限公司

定 價 320 元(不含運費)

**ISBN: 978-986-6624-72-8**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學富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版權所有。未經許可不得以任何方式或形式進行複製或重製。翻（影）印必究！

---

# 自序

希望、批判及行動，是教師工作的三部曲。教育作為一件「希望工程」，從事教育活動的教育工作者，一定是先懷抱有對於未來的希望，才會從事教育的工作。教師必然是先看到前頭的「光亮」，才會開始教書育人。教師與其他職業不同，其所看到的「希望」與「光亮」不僅只是自己的願望的達成，而是看到蘊藏在受教對象身上的無窮希望。教師也與其他期待於個人的助人行業有所不同，其他的助人行業所寄望的，是能夠「回復」對象原有的身心健康，但是教師所看到的，卻是學生對象身上無盡「發展」的未來可能性。

雖然秉持著對人性發展的正面希望，然而在面對現實環境的阻礙時，教師必然是有所不滿的。但教師的不滿，並非僅是來自於對自己需求滿足的焦慮，卻是來自於對於整體的教育環境無法達成其原先對於受教對象所懷抱之希望所致。簡單地說，就是教師憂慮整體的環境不夠「教育化」，或是如 P. Freire 所言的，不夠「人性化」。教師的不滿因而不是一種「負面」的破壞，相反地，它是一種藉著「批判」及「反思」所形成的一種正面動能，這種動能，當其轉化為實踐的行動時，就能形成一種正面向上提昇的力量，而它所提昇的，將不只是教育活動本身的實際而已，也將包括整體環境的改造，甚至也包括了教師及學生的人性本身的改善。因此，我們或許可以這樣說，對於從事教

育活動的教師而言，其批判離不開希望，而其希望則離不開行動。在這三個環節中，無論是批判或希望，最後都必須付諸實際的行動。因此，著名的教育哲學家 M. Greene 才會說，教師「註定要行動」(condemned to action)！！

依循著這樣的理路，本書名稱乃定名「批判與希望—以行動為中心的教師哲學」。而各章節的撰寫，大體上亦包含了批判、希望及行動三個主題。其中與批判明顯有關之篇幅所佔最多，共包括了四章，主要集中於 Freire 的解放教育學思想之引介以及當代批判教育學的發展的論述等等。筆者最先接觸到「批判」教育思潮，是在楊深坑講座教授的課堂上，而後來又在偶然的機緣下翻譯了 Freire 最知名著作《受壓迫者教育學》(*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乃因而有機會涉獵批判教育學的領域。在本書中，與 Freire 有關的章節計有兩章，除了鑑於 Freire 在奠立批判教育學基礎的重要性外，還應該是來自於 Freire 對我個人的啟發之故。此外，在 Freire 之後，不少學者試圖在「受壓迫者教育學」之外另闢「壓迫者教育學」的蹊徑，以補前者之不足；而千禧年後，亦有學者（如 I. Gur-Ze'ev）<sup>1</sup>針對批判教育學所可能產生的缺失，從後期批判理論及猶太教義的離散哲學 (*diasporic philosophy*) 架構出發所論述的「反向教育」(*counter-education*) 等。這些從筆者的角度來看，除了學者所欲達到的對於批判教育學進行省思及補充外，亦可幫助教育工作者對於何謂「批判」有著更深入的理解。

<sup>1</sup> 本序寫作當時，驚聞 Gur-Ze'ev 已於 2012 年元月逝世，國際教育哲學界於失去 R. S. Peters 這位大家 (Peters 於 2011 年 12 月辭世) 時，又失去此位健將，令人扼腕。

與認識。

在本書的第二部分，則是針對國內教育學術界目前較少論及的「希望」主題進行論述。其中第五章談到的是希望、教育與歷史上烏托邦教育作品之間的關係，筆者的看法是，在教育已逐漸成為一種漫不經心活動的今日，透過對於西方烏托邦作品的省思，重新咀嚼涵泳其中所蘊含之作者的熱情與希望，將能從另一角度持並激發我們對於教育工作的「終極希望」。在第六章的部分，筆者則從哲學的概念分析角度，解析了「希望」這個概念，並且認為在今日這個時代中，「希望」已經開始蘊含了「社會進步及改善之基本動力」的意義；筆者也借用了 E. Bloch「教育希望」的觀念，認為教育工作者應該具備此種教育希望的觀念。

在有關教師行動的部分，筆者在第七章中借用並擴大了 H. Giroux 所謂「教師即轉化的知識分子」之概念，分從教師的自我轉化、學生轉化、教材轉化、教學轉化以及社會轉化的不同角度探討了教師行動的不同面向，並且以西方教育史中幾位偉大的教師為例說明這些轉化行動的內涵與特點。筆者的看法是，教育的志業若要真正成功，教師的轉化是不可少的——而這種轉化不僅是反省，更必須付諸實際的行動。

身為一位在大學服務的「象牙塔中學者」，筆者坦承本書之撰述雖然有不少是來自筆者在教學活動與實地社會活動參與中的反省，然而大部分還是來自對學術文獻的研究及思考所得，其中仍有許多不夠周全及深入之處，亟待讀者的回饋及指正。不過，筆者於本書欲表達的觀點是，教育工作者最大的特徵就在於「希望」，最有力的武器則在於

「批判」，即便希望看似微弱渺小，批判看來蒼白無力，只要莫忘自己當初投入教育工作的初衷，在自己的工作中將希望與批判付諸實踐與行動，教育環境及整個社會終會有向上提昇的一天。

最後，本書的出版要謝謝在筆者學思過程提供協助的許多師友，包括廿年來在台北市立教育大學教育系定期舉辦之教育哲學研討會的師友，近六年來通識教育經典讀書會的諸位師友，以及楊深坑國家講座教授親自主持之研討班中的諸位師友等，而台灣師大教育系所提供的良好教學研究環境，這些都為筆者的學術研究工作提供了許多的激勵與支援。另外還要謝謝教育系 103 級同學張家禎願意提供畫作當成本書封面，在此一併感謝。還要特別感謝學富出版社的于雪祥先生，熱心鼎力協助本書的出版。沒有這些好友的幫忙，本書是不可能問世的。

方永泉 謹識  
於 2012 年 1 月 31 日

---

# 目次

自序 iii

第一章 Paulo Freire 的解放教育思想 1

第二章 Paulo Freire 與《受壓迫者教育學》 23

第三章 從「受壓迫者教育學」到「壓迫者教育學」 43

第四章 批判教育學新近的發展及爭議 81

第五章 教育、烏托邦與希望——西方烏托邦教育思想文獻初探 117

第六章 「希望」的哲學分析及其教育蘊義 151

第七章 充滿希望的教師行動——教師即一種轉化的知識分子 195

參考文獻 243

索引 257

# 第一章

## Paulo Freire 的解放教育思想

### ◎本章要旨

本章旨在說明巴西著名成人教育家 Paulo Freire (1921-1997) 的解放教育思想。Freire 不僅是一位摩頂放踵的教育實踐家，也是一位思慮精深的教育理論家，他的教育實踐活動不知道激勵了多少教育工作者積極投入社區及成人教育的活動，而他的教育思想也在當代教育學術研究中投下了巨大的震撼彈，有人甚至形容他的代表作《受壓迫者教育學》(*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可能是廿世紀下半葉最重要的教育哲學著作。在他的《受壓迫者教育學》中，Freire 所呈現的是一種從社會底層出發的教育學，因為這本書植根於他所處的具體情境，是來自於其在實地教育工作中直接或間接觀察到的社會現實，在不斷地奮鬥過程中，Freire 始終堅持著他的教育信念——那就是從「人性」出發的解放教育，而教育的目的就正在於「回復人性」。為了達到他的教育目的，Freire 堅持教學的方法應該是對話和批判，由此他開展出著名的「提問式教育」，以與傳統的「囤積式教育」區隔。簡言之，在 Freire 的教育思想中，理論的嚴密與系統並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流露在字裡行間的對於讀者的殷切召喚。對於那些想要投身於社會改造

工作、尋求教育實驗觀念與方法的人來說，Freire 的思想將可以對其生命歷程形塑過程產生莫大的激勵與啟發。

## 第一節 從博雅的（liberal）到解放的（liberating）教育

在西方的歷史傳統中，教育活動常依其性質及目的概分為兩種截然不同的課程：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與職業教育（vocational education），此兩類教育的對象及內容可說南轅北轍——博雅教育是提供給統治者的課程，以「勞心」為主；職業教育則是提供給被統治者的課程，以「勞力」為主。例如重視博雅教育的希臘先哲 Aristotle 在其《政治學》中就說：「博雅科目與非博雅科目有差異，只有不使學生產生呆板的知識才夠稱為教育知識。機械的課程，乃是那種使自由民的身心或智能在善的運用上不生效能的科目及技術。吾人為何稱呼身體勞力活動以及所有賺錢謀生的職業活動都屬卑賤活動，其故在此。」在 Aristotle 的認知中，博雅教育僅提供給那些有錢有閒的「『自由』民」（liberal citizen），這也是在西方，博雅教育之所以名之為「liberal」，而有時我們亦將「博雅教育」名之為「自由教育」（中國大陸的譯法）的原因。深究起來，博雅教育之所以為「自由」，預設了其教育對象必須在身體方面未受奴役，才能有更上一層樓追求心靈自由的願望，也由於它預設了受教者的身體自由，所以早期博雅教育其實蘊含了階級的意義在內，在古代社會中，這種階級往往是固定或世襲的，而上層階級對於底層階級的壓迫也多半被視為理所當然。

不過隨著時代的變遷，博雅教育所追求的「自由」

(liberty) 雖然仍是教育活動念茲在茲的理想，但是在當代，「自由」的觀念又進一步衍生出來「解放」(liberating)的觀念。在近代及現代的社會生活中，人們開始發現，社會階級不再牢不可破，某些人或團體因其出身背景而享有特權的情形也不再是不可挑戰的禁忌。加上歷來學者的啓蒙下，追求解放 (liberation, emancipation) 理想卻也成為受壓迫人們心內的最深沈的吶喊。解放的目的，是為了擺脫奴役，追求身體的自由，希望自己不再作為他人的奴隸而存在，對於致力解放的人來說，身體的自由也不再是先天既有的 (given, ascribed)，而是必須依靠自己努力掙出來的 (achieved)。在這種追求解放過程中，最重要的關鍵是在於受壓迫者本身意識的覺醒 (conscientization)，由於心靈自由必須先於身體自由，而透過教育的過程，使得受教者能先一步擺脫外在奴役所加諸的心靈枷鎖進而恢復身體的自由，就成了解放過程中十分要緊的工作。

與博雅教育相較，解放教育 (liberatory education, emancipatory education) 雖然也同樣地追求心靈的自由。不過在博雅教育中的心靈自由主要是閒暇的產物，它終究屬於生命中可有可無的點綴或裝飾；但對解放教育來說，身體與心靈的自由卻是攸關個體存亡絕續的頭等大事。更有趣的是來自「博雅的」(liberal) 與另一個英文字——「解放的」(emancipatory) 的對比，從字源的意義來看，emancipatory 這個字係由拉丁文中的兩個字 *manus* 與 *capare* 所組成，前者在英文中是 hand，後者則是 take 的意思。顯然，相較於博雅教育的「勞心」，解放教育似乎更有著「實際動手」的「勞力」味道在內。

為了追求真正的自由，光是勞心仍嫌不夠，還得加上勞力的實踐。

現代社會中的解放教育，其實對勞心或勞力的畫分並不明顯，主張解放教育者多半都強調教育工作者的躬身實踐，他們相信透過教育活動可以實際地改造人性及社會，回復人性的真正自由。而教育的第一步，就是在教導民眾學會「識讀」(literacy)，能用自己的話語來表達自己的意念及對世界的看法，進而在心靈上擺脫宰制者或自己所加諸的迷思及束縛，重獲真正的自由。而若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時，當代的博雅教育理想也不再遠在天邊，為了具體落實心靈自由的理想，一些學者（如 Leo Strauss）甚至認為，所謂的博雅教育（或自由教育）其實便是某種「識讀的」(literate) 教育，它是某種在文字中或透過文字施行的教育，它也是我們在民主社會中建立高貴氣質的必要努力。簡單的說，在今日的社會中，博雅教育與解放教育的距離並不是如我們所想像地那麼遙遠，現在的博雅教育應當不再僅限於少數特權階級才能享有的菁英教育，也應該以全民教育為它的教育對象，因為無論博雅教育或是解放教育，都擁有同樣的夢想或期望——那就是教導所有人們學會識讀，重新回復人性的自由。

為了實現人性解放與人類自由的理想，二次大戰後的西方世界出現了為數不少的解放運動，許多教育工作者紛紛在各地推行解放的教育活動。這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便是本章所要介紹的 Paulo Freire (1921-1997)，Freire 不僅是一位摩頂放踵的教育實踐家，也是一位思慮精深的教育理論家，他的教育實踐活動不知道激勵了多少教育工

作者積極投入社區及成人教育的活動，而他的教育思想也在當代教育學術研究中投下了巨大的震撼彈，有人甚至形容他的代表作《受壓迫者教育學》( *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 可能是廿世紀下半葉最重要的教育哲學著作，進而將其與偉大的教育哲學家 J. Dewey 的鉅著《民主與教育》( *Democracy and Education* ) 並稱。總之，無論從那方面來看，Freire 對當代教育理論與實際所具有的深刻影響，都使得我們有必要在今日社會中正視他的教育思想(特別是在成人教育的主張方面)。

## 第二節 Freire 其人其事——充滿樂觀與希望的教育工作者

Freire 在 1921 年 9 月 19 日生於巴西的海息飛 ( Recife )，該處位於巴西的東北部，可以說是當時第三世界中最貧窮的地區之一。Freire 的家庭原屬小康，但後來因外在經濟環境衰退影響而家道中落，Freire 從幼時便嘗過饑餓的滋味，這使得他對於社會底層階級的貧窮與饑餓頗能感同身受。惟相較於一般巴西的貧苦大眾，Freire 家中在物質上或有匱乏，但是在精神上還算豐厚。Freire 自述，其父母自幼所給予 Freire 的愛與照顧，對其後一生影響甚為重大，Freire 從與父母的相處經驗中，很早就開始珍視「對話」的重要性，也了解到如何去尊重其他人的抉擇。

當 Freire 的家境有所改善後，他進入了海息飛大學的

法律系就讀，並且研讀哲學與語言學。沈浸於當代重要學者的學說中，對他日後的教育思維產生重大的影響。從大學畢業後，Freire 很快地就成為一位律師，後來在一所中學擔任葡萄牙文的老師。1944 年，Freire 與第一任妻子 Elza Maia Costa Oliverira 結縭，Elza 為小學教師，兩人後來育有兩女一子。由於妻子教育工作及性格的影響，使得 Freire 開始對於教育工作產生了興趣。再加上身為人父，Freire 對於教育理論的興趣開始滋長，這使得他更廣泛地閱讀教育、哲學與教育社會學方面的著作。Freire 雖然在大學主修的是法律，但事實上他日後的生涯發展卻與法律工作沒有太多的關連，反而更多地與教育有關。

在服務公職的期間，Freire 與轄區內的窮人開始直接的接觸，其所從事的教育與組織工作使得他開始形成一套與貧苦大眾溝通的方式，這在日後也發展出其成人教育中的對話方法。1959 年時，他在海息飛大學獲得博士學位。Freire 也曾在海息飛大學中指導、教授教育哲學與教育史方面的研討會及課程，後來並成為海息飛大學文化推廣處的首位主任，這些都奠定他日後獻身成人教育的基礎。

1960 年代的巴西仍處於不斷的動盪中，許多團體所發動的改革運動都在這個國家中積極尋求他們自身的社會及政治目標。就在這樣的環境中，Freire 開始推展一些成人教育與工作訓練的計畫。其中有一項是在推動巴西東北部數以千計的農民識字的計畫。從 1963 年 6 月至 1964 年 3 月這段期間，Freire 及其團隊足跡遍及巴西，為了就是教導大眾識字。他們宣稱只要歷經卅小時的課程，就可以教

導成人文盲學會閱讀並寫字。Freire 及其團隊成功的祕訣，在於他們不僅是去教導那些農民讀寫的技巧，而是透過閱讀書寫的知識，提昇貧苦大眾的政治參與的動能與條件。當這些農民開始識字以後，其原有的被動性與宿命感會開始動搖，他們不再默默地接受自己的現況，這種結果使得 Freire 在當時既得利益者的眼中成為一個十分危險的人物。

1964 年 4 月，巴西軍方推翻了具有改革傾向的 Goulart 政府，當時巴西所有帶有進步意味的活動都受到壓制，Freire 亦被捕入獄。在囚禁的七十天內他反覆地接受審訊，此時他也著手撰寫其第一部重要的教育著作《教育即自由實踐》(*Education as the Practice of Freedom*)。但是這本書畢竟未能對於當時巴西產生實質的影響，因為在書還未寫成之前，他就被流放至智利。即使在流亡期間，Freire 仍然在智利從事成人教育工作。當時是由 Waldemar Cortes 主持該成人教育計畫。此一計畫後來吸引了國際的目光，也獲得 UNESCO 的認可，後者因而認定智利足可列入已克服文盲問題的國家之一。

1960 年代末，Freire 又有機會接觸到另一種新的文化，那就是美國文化。由於哈佛大學的邀請，他離開拉丁美洲到達美國，成為哈佛大學的訪問學者。Freire 在美國的這段時間，剛好也正是美國社會動盪起伏的時期。例如當時一些反越戰的運動，使得軍警進駐校園中。1965 年以降，種族不安的情緒更燃燒到美國的街頭；加上當時一些少數民族的代言人與反戰人士所進行的出版與教學的活動，皆深深地影響到 Freire。凡此種種，都使得 Freire 有

了新的體認，對他來說，美國經驗成為一種新的覺察契機。Freire 省思到，那些在經濟與政治生活中遭到壓迫與排擠的弱勢者，其實並不獨限於第三世界國家或是依賴文化之中。在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美國社會中，Freire 拓展了對於「壓迫」的另個向度的思考。

在美國的這段時間內，Freire 出版了他的最重要代表作——《受壓迫者教育學》。在這本著作中，Freire 清楚宣示，教育是通向真正解放之路。教育應該包括了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民眾藉由教育產生「覺醒」，覺悟到自己本身遭到壓迫；第二個階段則是要透過實踐（*praxis*）來改變整個壓迫的狀態。後一階段奠基於前一階段，Freire 因而主張，教育應該是一個不間斷的解放性文化行動過程。

Freire 於 1970 年代初離開哈佛，其後他曾擔任不同國際組織的重要成員，他馬不停蹄地到世界各地進行演講，全力投入亞、非等洲一些新近獨立國家（包括坦尚尼亞、幾內亞比索等國）的教育計畫裡頭。1979 年 Freire 應當時巴西政府之邀，結束流亡生涯重新回到國內，並在聖保羅天主教大學任教。1988-1991 年間，他還擔任聖保羅市的教育局長，領導巴西當地的教育改革工作。

1992 年時，超過兩百名來自世界各國的成人教育工作者、教育改革者、學者及基層社會運動者齊聚紐約慶賀 Freire 七十歲生日，當時亦曾舉辦了各種學術活動及工作坊來對 Freire 表達敬意。1997 年五月二日，Freire 不幸於里約熱內盧（Rio de Janeiro）辭世，享年七十五歲。